



农民工生活质量研究 来自个体的报告

陆文荣 段瑶 ©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农民工生活质量研究 来自个体的报告

陆文荣 段瑶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民工生活质量研究:来自个体的报告/陆文荣,
段瑶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ISBN 978-7-208-15060-7

I. ①农… II. ①陆… ②段… III. ①民工-生活质
量-研究报告-中国 IV. ①D4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2962 号

责任编辑 罗俊华

封面设计 夏芳

农民工生活质量研究

——来自个体的报告

陆文荣 段瑶 著

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5.5

插页 4

字数 226,000

版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060-7/C·557

定价 48.00 元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2016zlk08)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 (16YJC710030)

杭州市“131”中青年人才培养计划

目 录

第 1 章 导论 / 1

1.1 选题缘起 / 1

1.2 研究意义 / 8

1.3 概念界定 / 10

1.3.1 农民工 / 10

1.3.2 生活质量 / 10

1.3.3 生活满意度 / 12

1.3.4 精神健康 / 13

1.3.5 社会反馈行为 / 14

1.3.6 社会结构困境 / 14

1.3.7 社会认知 / 14

第 2 章 文献回顾与研究框架 / 16

2.1 生活质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 16

2.2 农民工的生活质量研究 / 37

2.2.1 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研究 / 38

2.2.2 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研究 / 42

2.3 本书研究框架 / 53

第3章 数据、变量与方法 / 65

3.1 调查基本情况 / 65

3.1.1 问卷 / 65

3.1.2 抽样 / 66

3.1.3 样本基本情况 / 69

3.2 主要变量及其操作化 / 76

3.2.1 主要因变量 / 76

3.2.2 主要自变量 / 78

3.2.3 主要控制变量 / 80

3.3 数据分析方法 / 80

3.3.1 单变量描述统计 / 80

3.3.2 单因素方差分析 / 80

3.3.3 双变量相关分析 / 81

3.3.4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81

3.3.5 二分 logit 模型 / 81

3.3.6 路径分析 / 81

第4章 农民工的生产与生活现状 / 83

4.1 农民工的社会结构困境 / 83

4.1.1 社会地位 / 83

4.1.2 劳动权益 / 90

4.1.3 居住生活 / 96

4.1.4 社会关系 / 104

4.1.5 经济条件 / 113

4.1.6 业余生活 / 119

4.2 农民工的社会认知状况 / 125

4.2.1 相对社会地位 / 125

4.2.2 对迁移持积极肯定评价 / 126

- 4.3 农民工的生活质量现状 / 127
 - 4.3.1 生活满意度处于一般水平之下 / 127
 - 4.3.2 精神健康风险并未显著高于其他社会群体 / 131
 - 4.3.3 捐赠次数少、额度小、渠道单一 / 134
- 4.4 小结 / 138

第 5 章 农民工的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 140

- 5.1 社会结构因素对农民工的生活质量的影响 / 140
- 5.2 社会认知因素对农民工的生活质量的影响 / 151
- 5.3 结构和认知对农民工的生活质量的影响的对比分析 / 155
 - 5.3.1 社会结构因素和社会认知因素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 159
 - 5.3.2 社会结构因素和社会认知因素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的影响 / 160
 - 5.3.3 社会结构因素和社会认知因素对农民工捐赠行为的影响 / 161
 - 5.3.4 控制变量的影响 / 162
- 5.4 不同代际农民工的生活质量的比较 / 163
- 5.5 小结 / 167

第 6 章 结构、认知与农民工生活质量的因果分析模型 / 169

- 6.1 社会结构作用于农民工的生活质量的路径分析 / 169
- 6.2 社会认知因素对社会结构决定效应的调节作用 / 176

6.3 小结 / 188

第7章 结论与讨论 / 189

7.1 主要研究结论 / 189

7.1.1 生活质量可以包括生活满意度、精神健康和行为三个层面 / 189

7.1.2 社会结构因素对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影响 / 190

7.1.3 社会认知因素同样对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影响 / 194

7.1.4 不同代际的农民工的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存在重要差别 / 196

7.2 讨论 / 197

7.2.1 如何理解并测量生活质量 / 197

7.2.2 生活质量的“结构—认知”模型的普遍适用性 / 199

7.2.3 从农民工的生活质量看中国城镇化的道路选择 / 200

7.3 研究创新与不足 / 203

附录 部分数据统计分析结果 / 206

参考文献 / 222

后记 / 242

第1章 导 论

1.1 选 题 缘 起

我就站着那样入睡

眼前的纸张微微发黄
我用钢笔在上面凿下深浅不一的黑
里面盛满打工的词汇
车间,流水线,机台,上岗证,加班,薪水……
我被它们治得服服帖帖
我不会呐喊,不会反抗
不会控诉,不会埋怨
只默默地承受着疲惫
驻足时光之初
我只盼望着每月十号那张灰色的薪资单
赐我以迟到的安慰
为此我必须磨去棱角,磨去语言
拒绝旷工,拒绝病假,拒绝事假
拒绝迟到,拒绝早退
流水线旁我站立如铁,双手如飞
多少白天,多少黑夜
我就那样,站着入睡

出租屋

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
局促,潮湿,终年不见天日
我在这里吃饭,睡觉,拉屎,思考
咳嗽,偏头痛,生老,病不死
昏黄的灯光下我一再发呆,傻笑
来回踱步,低声唱歌,阅读,写诗
每当我打开窗户或者柴门
我都像一位死者
把棺材盖,缓缓推开

最后的墓地

机台的鸣叫也打着瞌睡
密封的车间贮藏疾病的铁
薪资隐藏在窗帘后面
仿似年轻打工者深埋于心底的爱情
没有时间开口,情感徒留灰尘
他们有着铁打的胃
盛满浓稠的硫酸,硝酸
工业向他们收缴来不及流出的泪
时辰走过,他们清醒全无
产量压低了年龄,疼痛在日夜加班
还未老去的头晕潜伏生命
皮肤被治具强迫褪去
顺手镀上一层铝合金
有人还在坚持着,有人含病离去
我在他们中间打盹,留守青春的
最后一块墓地

.....

2014年10月1日,一位在富士康打工的诗人坠楼,警方疑为自杀。他叫许立志,就像很多很多在全国各地的打工仔一样,也像历史上很多很多的诗人一样,如果不是因为自杀,他们的名字似乎并不能这么快地获得大面积传播被公众知晓。他,被称为“打工文学”的接班人。上面援引的几首散文诗即是出自他手。这一次的自杀让笔者不禁想起2010年富士康“11连环跳”。这些鲜活的生命似乎已经足够唤醒我们去回答以下基本问题:农民工究竟在城市生活得怎么样?他们如何评价自身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这是本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要认识农民工这个群体,也需要有社会学的想像力,社会学的想像力的基本特征是“关注历史中的社会结构;而且它的问题是与其紧迫的公众议题和持续的人类困扰直接关联的”。^①经典社会学家们往往是基于自己在转型社会中的经历和困惑开启自己的社会研究的,他们关注个人和社会,其实还是为了更好地追寻自己的人生意义。如果严格按照社会研究规范,他们的研究或许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其留下的研究成果却永远闪耀着关于如何理解个人在世界中的意义这一终极关怀的光芒。研究者个人生命体验对社会研究的影响可见一斑,尤其是研究题目的选择。费孝通晚年回顾自己学术研究历程的时候指出,“我越来越觉得一个人的思想总是离不开他本人的切身经历”。^②

笔者选择农民工生活质量这一研究议题,最初并不是因为理论方面的兴趣,而是生命体验的刺激与触动,或者说个人生命体验为自己的社会研究设定了一个问题域。笔者对宏观社会情势的关注也是围绕这一问题域展开。落实到确定具体的研究问题和方法,则需要仔细回顾学术界已有研究,其实这也是注重规范的社会研究者们最为看重的。

就笔者个人有限的生命经历来说,选择研究农民工群体或许是命定的。记得博士研究生招生面试之时,主考官老师追问为什么计划读博期间

① [美]赖特·米尔斯著,陈永强译:《社会学的想像力》,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6页。

② 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载于《文化的生与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研究农民工,我很认真地回答:“如果我不是通过读书流动到今天的位置,我也会和他们一样,背着行囊,为生计来回奔波。”这些年,笔者似乎觉得自己一直背负着一种使命,那就是真实记述父辈们、儿时玩伴们在城市的生存状态,并适当表达给全社会。这种使命感直接来源于笔者近些年在城市与农村两个不同社会空间的生活感悟。

笔者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上大学之前从来没有离开县城。所以当笔者第一次进入城市的时候,也多少遭遇了费孝通所描绘过的传统乡土性对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诸多不适应。这种感觉在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尤为强烈。2009年来沪求学之后,笔者感到长期在农村生活养成的性格、思维和行为习惯与城市的现代规则显得格格不入。这是一个强调竞争、个体独立、充满异质性、不大讲感情的场所。特别是笔者求学之处位于上海市的正中心,那真是一个钢筋水泥的世界,挺拔的高楼、宽阔的硬化地面、琳琅满目的商品、川流不息的人群……总之,笔者感觉到了压抑,想寻找泥土的芬芳。这种感觉就如贺雪峰笔下的“村庄生活的面向”。“村庄生活的面向,是指村民建立自己生活意义和生存价值时的面向。有人长期在外工作和生活,但他梦中萦绕的都是家乡的山水,所谓乡土情结,这就是他的生活面向。”^①或许,这就是那魂牵梦绕的乡愁。

所以笔者会在上课之余,不断往上海郊区跑,不断往上海城中村跑,寻找一种乡音乡情,寻找一种让人感觉舒服的“人情味”。在这来回奔波之中,笔者的确看到了一般民众“看不见”的一面,特别是超乎我们想像力的农民工群体。

顺昌路老弄堂里,来自江西的一对夫妇在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出租屋中营造了自己的小家庭。每到暑假,儿子还会过来跟他们团聚;漕溪路高架桥下面、上海南站高架桥下面、莘奉金高速剑川路段高架下面,都有农民工临时搭建的居住场所;来自安徽的一拾荒老人选择地铁3号线宜山路站空调出风口作为自己晚上的栖身之所;来自湖北的刘姓夫妇在松江区种植蔬菜大棚,收益不错,但是为了子女的学业,妻子将选择回家陪读;银都路虹梅南路路口,每天都有一群散工聚

^①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1页。

集在那里,承接各种木工和砖瓦工等装修的活计;闵行区华东师范大学附近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从事快递收发工作的安徽青年,为了积攒加盟某食品连锁店的资本,每天要送货到晚上十点钟;还有南京东路凌晨时分突然从旁边支路涌出来的摊贩们……

这些鲜活的生命对笔者形成了很大冲击,重塑也丰富了笔者关于这一群体的想像。无法想像,当十几年前城市对农民工群体还不是那么包容的时候,父老乡亲们春节返乡时刻的喜气洋洋需要城市多少艰辛来支撑。

本书写作前后笔者依然作为亲历者体验着他们在城市的诸多不易。笔者的堂哥J,与我同龄,中专学历毕业,能够熟练操作数控车床。由于老家工作机会少、工资低,2012年秋天来上海务工。他在上海找到第一份工作大概花了二十天时间,最后由一家人力资源公司采用劳务派遣形式进入了一家外资企业。作为劳务派遣工,他的待遇自然与企业正式职工存在差异。到了工厂生产淡季,为了增加收入,他在地铁站找了一份搬运工的兼职,这样每天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有时候会在上班时间小憩一会。平均下来,他每个月能拿到四千元工资。周末他喜欢到学校找笔者聊天,原因是在工厂宿舍“闲着没事可干”。他还羡慕笔者,说:“你毕业以后可以在城市安家,真好!”笔者童年的玩伴N,与我同龄,技校毕业,2005—2011年在青岛一家电子公司从事维修工作,月平均工资2500—2700元,由于感觉工资低,并且不愿意上晚班,结婚生子后辞掉工作回到农村老家,在老家考了驾照,偶尔做零工,后迫于经济压力,加入亲戚的工程安装队,专门承接电厂安装工程。2013年下半年去新疆喀什做工程,2014年上半年到安徽安庆电厂做工程。工程安装完后,赋闲在家,等待下一个承包项目。其间,家人劝他从事一份稳定的技术工作。他遂于2014年8月来上海,原以为这边电子厂比较多,找工作方便,结果半个多月面试七八家企业,都觉得不合适。因为他实在厌倦了流水线操作工种,所以选择回老家继续等待新的承包工程。临行前他告诉笔者:“我现在好像得了职业病一样,看到流水线就觉得恶心。那种工作单调重复,而且工资全靠加班。以后再也不愿意进工厂了。”这些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的“80后”农村青年,其实要求并不奢侈,他们就是想找一份能够维持生存又能够有所发展的工作,但结果并不如意。笔者的叔叔外出内蒙、青岛打工,对外出打工的感觉如下:“都说打

工好,可以赚到钱,但是那种在劳务市场上被当作牲口一样挑来挑去的感觉真不好受。”如今,他再也不去劳务市场找工作,也很少出门。

这些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使得笔者时常忍不住想:“作为农村出来的孩子,我与他们有什么不同?”笔者在城市读书,他们在城市打工,我们看起来如此不同,但是我们又曾经何其相似,命运的这种偶然安排真的会让我们分道扬镳?作为农民工的子女,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朋友,笔者生命的相当一部分无法绕开他们。正如熊易寒所说:“我不只是在书写他们,我也是在寻找自己。”^①这样,笔者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注也就回到了经典社会学的研究传统。

就宏观社会变迁而言,农民工这股洪流让作为社会研究者的笔者无法置若罔闻。

流动构成了转型中国社会最鲜明的时代特征,既包括纵向的社会地位变化,也包括水平的位移。无疑,广大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构成了中国这一流动社会的重要主体。每年春节前后他们在城乡之间的大规模候鸟式迁移即是明证。在城市工商业“拉力”之下,他们为了寻求更好的经济条件或发展机会不断流动在城乡之间、城城之间和城市内部。

这一群体从最开始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发展到今天的“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其流动规模和半径不断增大。他们或被称为“城市盲流”,或被称为“打工妹”和“打工仔”,或被称为“农民工”,或被称为“城市外来人口”,或被称为“新市民”,或被称为“新工人”。无论遭受何种歧视、排斥以及其他不平等的待遇,他们终于在城市生根发芽,活跃在城市的街头巷尾,主要从事工业生产和中低端服务业工作。他们不仅被城市的经济子系统所吸纳,也慢慢融入到城市社会子系统中,成为其中一股无法被忽视的构成性力量。

历史地看,农民工流动过程可以划分为若干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农民进城主要是基于国家资源配置的需要,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操控。比如全国设置若干工业矿业城市,以及国家工业化开启,都对劳动力产生了一定需求。但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以及城市生活物资的短

^① 熊易寒:《命运的政治学》,《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

缺决定了农民进城数量的有限性。1958年中国户口登记管理制度的出台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即控制农民进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市场逐渐成为拉动农民进城的主要动力。特别是80年代乡镇企业的辉煌,小城镇成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亦工亦农、半工半农、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主要指称这一阶段农民工的流动状态。9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确立,开启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市场化浪潮。诸多经营性行业对外来资本和民间资本进入降低门槛,造成了中国二、三产业在沿海地区的集中。于是出现了一股劳动力大规模从中西部向东部沿海,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涌动,所谓“孔雀东南飞、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至今这一趋势仍然没有根本改观,虽然也有诸多研究显示,近些年资本西进(资本在中西部投资设厂)和农民工返乡创业已经显露端倪。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全国农民工动态监测数据,2016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8171万人,比上年增长50万人,增长0.3%。本地农民工11237万人,比上年增长374万人,增长3.4%。江浙沪一直都是农民工的主要输入地,2012年统计显示,江浙沪农民工数量占同期全国农民工数量总量的23%左右。随着江浙沪转型升级,腾笼换鸟政策的转向,中西部地区获得了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机遇,劳动力出现一定回流,但是根据往年估算,仍然维持5000万左右的数量。^①

农民工流动引发了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自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截止到2017年12月份,笔者在中国知网数据库共搜索到16669篇以农民工为关键词的研究文献。这些研究主题多集中在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农民工聚居区、身份认同、维权抗争、城市融入、市民化与公民权、劳动力市场等方面。关于农民工生活质量的系统研究并不多见。虽然富士康跳楼事件发生后,政府、企业、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开始重视农民工精神健康和社会心理,但是笔者在中国知网数据库共搜索到以农民工生活质量为关键词的研究文献42篇,以农民工精神健康为关键词的研究文献5篇,以农民工生活满意度为关键词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官方统计网站,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12_551585.html。

的研究文献 26 篇,以农民工捐赠为主题的研究文献几乎没有。同样,以流动人口与生活质量为主题的研究也并不多见^①。由是可知,学术界关于农民工生活质量的研究还比较匮乏,而且缺乏系统性。本书旨在这一研究方向做一尝试,主要研究内容为农民工生活质量基本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1.2 研究意义

研究农民工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首先,研究农民工生活质量是转换农民工研究视角的重要尝试。如前所述,已有的农民工研究文献集中在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网络、社会认同、城市融入、城市公民权等维度,有学者总结为研究的城市取向、制度取向和社会网络取向^②。城市取向的研究主要关注农民工如何适应城市并融入城市,社会网络取向的研究主要关注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组织化状况等对其就业、社会交往、身份认同、消费等影响,制度取向则关注农民工在城市面对的制度限制,比如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安排。但农民工的生活质量方面的研究较少,这需要关注他们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世界,偏重于农民工基于生活各个层面的认识和感受、对生活各方面的评价和总结,包括心理上的满足感、幸福感和生活充实感。所以农民工生活质量研究其实是从农民工角度出发对外在实体世界的评判,农民工自身成为衡量外在生活世界的价值尺度。

其次,农民工生活质量研究强调了每一个具体的、特殊的农民工个体的重要性。本研究对农民工生活质量的测量是基于农民工个体层面而非农民工群体层面的建构,这就使得具体的农民工个体从抽象的农民工群体中解放出来。即,农民工生活质量是来自农民工个体的报告,而非基于群体的强制性抽象^③。在这种研究方法论指导之下,生活质量“对我来讲,意

① 在中国知网,以流动人口和生活质量关键词共搜索到 7 篇文献,为篇名共搜索到 5 篇文献。

② 王道勇:《农民工研究范式:主体地位与发展趋向》,《社会学评论》2014 年第 4 期。

③ 马克·拉普勒著,周长城译:《生活质量研究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67—73 页。

味着感觉良好和以尽可能最好的方式去拥有你的生活所需物”^①。而诸如人均收入等社会指标则显得“不那么相干”。

再次,农民工生活质量研究可以为“社会政策时代”的中国政府提供科学依据。“社会政策时代”这一理论话语已经得到社会政策学术群体的广泛关注,并引起过激烈讨论。李棉管对这些争论进行了回顾梳理,认为“社会政策时代”真正来临的标志有两个:第一,社会政策走向公共政策的中心地位。第二,一种新型的与经济政策协调发展的具有投资效应的积极社会政策占据社会政策的主流^②。笔者以为,“社会政策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应该以“人民幸福”为依归。以此衡量,则中国正在逐步进入“社会政策时代”。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近些年一系列总体性政策设计即是最好的证明,比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总宣誓,中国社会管理格局的顶层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再发展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统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更加重视社会公平等。中国目前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作为中国最多数的农民工及其家庭如果不能达成小康,则中国不小康^③。所以如何提升广大农民工的生活质量,使其体面地过上小康生活是执政党和政府的当务之急。中国各级政府也正在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创新为农民工提供社会服务的方式和维护农民工权益的途径。本书关于农民工生活质量的研究可以为服务农民工的社会政策提供重要依据,它将会呈现农民工生活质量的基本情况,以及影响农民工生活质量的因素。

最后,需要从研究对象角度来审视本项研究的意义。本书虽然主要关注的是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但是研究结论或可推广到一般城市移民。本书虽然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但是可以更好地反衬出类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态。从这个角度讲,本书研究结论的解释范围得以拓展。在公共(行

① Robert Groulx, *President, People First of Montreal*, cited in Groulx et al., 2000:23.

② 李棉管:《再论“社会政策时代”》,《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③ 卢汉龙:《转换中国社会发展研究的路径:以“小康阶层”取代“中产阶级”为尝试》,《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11期。